

第一章 为什么要制造城市

第一节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

1980 年 8 月 26 日，中国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
新生事物——经济特区。它把中国从计划经济建设社
会主义的模式拉到了以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的
正确轨道上来。

历史沉重地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行不通的，把自己
孤立于世界之外总是要吃苦头的。7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反复探索：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在经历了无数曲折、付出了惨痛代价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拨乱反正，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新形势下发展经济，照搬苏联僵化死板
的计划经济模式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必须根据中国自己的实际
情况，大胆改革经济体制，重新探索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新
路子。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一个突破口，中国改革开放同样需要排
头兵。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
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

于是，1980 年 8 月 26 日，中国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生
事物——经济特区。中央决定，在计划经济体制相对薄弱的深
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建立经济特区，利用它们毗邻港澳台

地区，便于引进外资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区位优势，率先确定为进行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80年代初，在全国仍然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情况下，新成立的深圳市政府大胆改革，决心跳出现行经济体制的旧框框。于是，相继对基建体制、财政体制、价格体制、土地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金融体制以及国营企业内部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胆改革。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极大地刺激了市场，辐射到全国，各地的资金和劳动大军汹涌而至，深圳成为一块投资创业的乐土，创造了著名的“深圳速度”和“深圳效应”。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深圳已经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四大城市前列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现在，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已经是为数不多的国家级园林城市，深圳更成为国际花园城市 and 全球环境“500 佳”城市。至此，深圳由一个功能单一的经济特区，向一个全面发展的国际性大城市跃进。

20 多年来，经济特区就像一个伟大的支点，撬动了中国旧体制的巨石，撬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推动中国在短短的 20 多年间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更重要的是，它把中国从以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拉到了以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的正确轨道上来。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刚刚迈进 21 世纪的全球经济突然寒流阵阵，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一再减缓，日本经济长期陷入泥潭，香港和新加坡则停滞不前。根据 IMF 和 OECD 等权威组织预测，2005 年世界经济将陷入 20 多年来最严峻的“增长性衰退”。目前，不少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以及企业界人士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表现出较大的忧虑。他们担心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因为外需的不振而调头大幅下行。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在 2001 年，我国外贸出口呈现逐月回落的态势，比 2000 年同期减少 20 多个

百分点。贸易顺差为 114.5 亿美元，比 2000 年同期减少 50 多亿美元。顺差的减少，弱化了外需对经济的拉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一大难题。目前看来，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长期的恐怖阴影将加深经济低迷，全球经济仍持续放缓。在外需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宏观调控的着眼点必须放在如何扩大内需上。专家们分析，中国扩大内需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居民储蓄、外汇储备、财政收入、粮食储备雄厚。同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东西差距，城乡差距，蕴藏着巨大的需求空间。在扩大内需方面，从以前单纯的增加投资和消费，已延伸至结构调整、改革、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可持续发展等方方面面。邓小平同志说：“发展就是硬道理”。经济要不断增长，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就必须从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自我，扩大国内需求。这是实践的结论，是今后不能动摇的方针。在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中，70% 以上来自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贡献。我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既是我们的国情，又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王牌”。国家统计局测算表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当于城镇居民的 1/3，滞后城镇消费水平整整 8 年时间，如果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现在的不足 40% 提高到 50%，就意味着国民经济新增 8000 多亿元的消费需求。如果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东部现在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将形成 1.7 万亿元的增量。潜在的需求一旦化为现实的需求，将为中国经济飞跃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怎样挖掘这一潜在的需求呢？最快速、最有效果的办法就是制造城市。只有在广袤的农村地区制造一座座新城市，才能强有力地刺激内需，极大地拉动经济的增长，促进中国经济再次腾飞。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为了让中国经济列车继续高速运行，就必须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

第二节 加速城市化

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这是我国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

只有在广袤的农村地区制造一座座新城市，才能强有力地刺激内需，极大地拉动经济的增长，促进中国经济再次腾飞。

城市是随着市场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人流和商流是协同一致的，先有“市”，后有“城”，从而形成一个城市。城市是劳动力、资本、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从各方面聚集起来而形成的一种庞大生产力。这种庞大的生产力，可通过聚集而产生的集成效应使生产力成倍、成十几倍甚至成几十倍地放大，这不仅强有力地推动城市本身的发展，更可通过它的辐射力、扩散力、反作用力，推动农村经济的结构性发展，从而强力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实施城市化战略，推动城市化进程，是“十五”计划《纲要》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1978年到2000年，我国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4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20312个，市镇总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4.5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9%提高到36.1%。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推进城市化的条件已渐趋成熟。

随着如火如荼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发展，中国城市化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可是从蹒跚中起步的中国城市化一开始就变得那么摇摆不定：先是过去几十年的人为控制，在世界城市化的浪潮出现了反常的逆城市化趋势。而后则是“圈地运动”，城市化在一阵小跑中掀起了滚滚泡沫，影响着城市的正常发展。城市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有着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人为

压制或过度扩张都是行不通的，不按城市发展的规律去办更要碰壁。现在国内不少城市的通病，就是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走到哪算到哪，城市建设见缝插针，最后弄得“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一个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几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今天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想想是否为我们的后代留点值得纪念的和具有历史价值的空间。

城市化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除了适应现代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外，还要考虑如何与中国最大的农村嫁接。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缺乏农村支撑的城市化只是空中楼阁，而缺少城市化的社会将没有生机与活力。城市化的进程，对农村大国的中国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农民“洗脚进城”的问题。而数十年把无数农民挡在城市外面的一纸户籍已被取消，让真正具备条件的农民进城。

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这是我国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全国现有大中城市 664 个，另外还有 1.9 万个建制镇。但是，城市化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80% 以上的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 40% 以上的平均水平。即使和我们自己的工业化水平相比，也落后 20 个百分点。我国的人均收入不到 800 美元，就遇上了生产过剩，农产品商品率不到 30%，广大农民卖难买也难，这与其说是农业落后，拖了工业的后退，不如说城市化滞后，影响了农业，连累了工业。由于近年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产生出魔幻般的吸引力，滞后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今天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滚滚浪潮。是的，城市化就是市场化，激活一个点，就能辐射一大片。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城市化将是一个影响中国未来 50 年的大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城市化问题呢？一个有效的思路就是在中心城市周围建设分担型的中小城市，这些中小城市通过先进的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就可以缩短与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据有关专家预测，全国城镇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将相应上升 1.4 个百分点，可拉动房地产投入 1000 亿元，拉动 GDP 增长 1.5 个百分点。所以，制造中小城市，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推进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城市人口的增加，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必将大幅度上升，这对扩大农产品市场容量，稳定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都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制造中小城市，必然会快速推进大规模的交通网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住宅建设，从而扩大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引导大量的人才、信息、技术向城市汇聚，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从而为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良好条件。

第三节 唤醒“休眠”的民间资本

审视我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症结：“需求不足，投资无门”。只要解开这个症结，8 万多亿的“笼中虎”就会从银行跑出来，内需就会成百成千倍的扩大。那么，谁能解开这个生死之结呢？——制造城市，只有制造一座座新城市，才能彻底解开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死结，才能再次启动中国经济，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2002 年 3 月 10 日第一期凭证式国债发售时，即从大江南北传来热销的消息：广州市民提早排队购买，国债不到几小时就脱销；上海有的银行网点规定每人限购 1 万元，还是供不应求；满北京城都在排队买国债……

面对国债销售的火爆态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老百姓具有很强的投资欲望。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止到 2002 年 6 月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 8 万亿元。如果加上居民手中

持有的现金、国债、股票、外汇等，实际的民间金融资本存量早已超过 10 万亿元，但大部分并没有进入投资领域。即使是民间投资相对比较活跃的浙江省，目前仍有 3500 亿元民间资金闲置，占到其总量的 $\frac{2}{3}$ 。一方面国家急需大量建设资金，一方面巨额资金躺在银行里“休眠”，这是近年来我国投资领域的怪现象。

民间资本的沉睡不醒，并不是他们没有投资的欲望，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许多人认为，传统行业的竞争日渐白热化，效益回报已显疲态，几乎没有什么投资空间而言。而那些有发展前景、高回报的产业垄断门槛高筑，民营企业很难分得一杯羹。即使在允许进入的领域，民间资本的审批程序也要复杂、困难得多，所受的待遇最低，所受的限制也最多。广东省东莞市是一个私营经济发展环境较宽松的地方，然而就在这里，全市 80 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 62 个，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 41 个。然而，行业准入并不是惟一的政策门槛。据测算，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税赋负担率总体上比内资企业约低 5 个百分点。在许多地方和领域，外资企业可以获得免税、减税和缓税等优惠政策，而民营企业则无权享受。经济学博士王永海说：这对于曾经急需外资进入，激活经济的时期来说是必要的，但现在不能再这么认为了。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国外资本应在同一个平面上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活力。

中国投资协会有关负责人说，1980 年至 2000 年的 20 年间，民间投资 7 万多亿元，占到社会总投资的 30%。而在就业方面，1991 年至 2000 年的 10 年间，国有单位因精减人员减少了 2500 多万人，而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却吸纳了 2600 多万人就业。可见，民间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和社会效益有目共睹。然而，在许多地方，挤压排斥、滋扰民营企业的行为时有发生。有个县政府甚至出台这样一个怪政策：凡是私人投资兴办的企业，必须预先上报产值和营业收入，并根据这个数字提前征收税费。西部某市的一个街道办事处规定，辖区内凡私人企业每季度必须交纳数千元的治安费，国有企事业单位免征。

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持续不断的动力。如果唤醒“休眠”的民间资本，就能为经济增长装上新的引擎。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大背景下，这种要求显得更为迫切。目前，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滞后，企业内部的债权关系尚未清晰规范，出资人缺位，经营者缺乏有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企业自我发展的动力不足，国有投资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国债的投资。不少人担心，一旦国债停止发行，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很可能下滑，通过扩大投资支撑经济增长就会成为问题。专家们分析说，排除部分持币者“存钱备用”外，已有相当规模的资金有着较强的投资欲望。如果有1/10能够从“休眠状态”进入“市场状态”，就会有上万亿资金进入投资与产出的良性循环，释放出来的活力将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仍然不能尽快向民间资本打开大门，挡住的就不仅仅是资金流，更有可能将一块潜力巨大的市场拱手让给外人。

回望前几年，由于经济低迷，市场疲软，购买力不足，整个社会商品和服务供过于求，产品大量积压，物价持续下跌，企业生产力闲置，工厂亏损，商业竞争激烈，工人大量失业，银行不良资产骤增，社会债权、债务案增加，社会平均收入下降。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把中国经济拉出疲软的泥潭，政府金融部门连续8次降息刺激消费和投资，连续发行5000多亿元债券，扩大基础建设规模，以求拉动投资需求；刺激股市，试图制造“赚钱效应”来拉动消费；以“债转股”方式把银行资产变成企业资产，以救国有企业出困境，让8000万人普涨工资，直接刺激消费需求。最后一招，就是向社会各界储蓄征收利息税，以图将数额庞大的储蓄存款拉动市场，启动经济。但是，市场依然疲软，通货紧缩旋涡仍在下沉，继续损害我们的经济肌体，恶化我们的市场环境，破坏我国的生产力，延误经济发展的时机。

审视我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症结：“需求不足 投资无门”。只要解开这个症结，8万多亿元的“笼中虎”就会从银行跑出来，内需就会成百成千倍的扩大。那么，谁能解

开这个生死之结呢？——制造城市，只有制造一座座新城市，才能彻底解开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死结，才能再次启动中国经济，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第四节 解决就业难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4 亿人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由于他们所受教育有限，不能从事经济增长所创造的高新技术工作。因此，只有创造大量的技术含量低的传统性工作岗位，才能解决这一致命问题。毫无疑问，制造新城市是最佳的解决办法。

“十五”期间，我国将有 4000 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这 4000 万人相当于“十五”初期我国城镇从业人数和职工人数的 18.87% 和 35.7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预测：我国在未来 5 到 10 年左右的时间内，每年需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出 1500 万到 2000 万农村剩余劳动力，10 年内总规模需要达到 1.5 亿到 2 亿人。只有实现这个转出规模，才能保证城乡之间的利益矛盾不致激化。因为我国的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积的 7%，按照世界平均农业生产率大致推算，我国的种植业最多只需要 4000 万到 5000 万人，而 2000 年末，我国乡村就业人数约为 5 亿人！因此，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已经没有后退的历史余地了。不做好这件事，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就会变得十分艰难，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没有新的希望。

目前，中国劳动就业问题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从政府公布的数字上看，1998 年全国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人数是 609 万人；1999 年是 492 万人；2000 年则只有 361 万人，实现再就业的人数逐年递减。而且，根据调查，失业之后的再就业，往往很不稳定，“再就业”的时间非常短暂。因此，实际上的再

就业状况不容乐观。这是在政府高度重视就业问题而通过各种措施“再就业工程”的情况。我国经济这几年一直是以每年 7%~8% 的速度不断增长，而失业率却不断上升，“再就业工程”对解决失业问题的作用又杯水车薪，这是怎么回事呢？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认为：对于中国近年来大量失业和下岗现象，人们的解释有三个角度。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经济不景气；三是产业结构转换。于是，人们认为：失业或下岗是由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的，一旦这些暂时性的问题得到解决，失业者将重新获得就业机会。因此，人们对“再就业”机会寄予厚望。但事实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淘汰，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观察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会发现，新的工作位置并没有多少是为失业或下岗者准备的。目前，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特征：年龄基本在 35 岁或 40 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一般是从事低技术的工作。而新的就业机会，则需要比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主要面向年轻人。这就是说，即使新的经济增长来临，即使国有企业的改革搞好了，这群失业和下岗者的状况也难有根本的改观。因此，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不可能；第二，在目前体制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也不可能；第三，朝阳产业的就业机会更不会向他们招手。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分析法国社会结构过去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而今天则是一场马拉松，人们像在跑马拉松比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他认为，当前在法国还能继续跑下去的只有四五百万人，其余的都是掉队者。坚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去的就业者；而掉了队的，则是被新的社会秩序甩了出去。实际上，今天的中国也发生着同样的问题。就是说，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是社会新秩序的淘汰者，他们已经被甩到新的社会结构之外，而且这个群体规模庞大。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将现在的失业或下岗现象

仅仅看做是由于某些暂时性的原因，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就是创造再就业机会。如果承认这些失业和下岗者永远都很难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那么，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作出某种制度性的安排，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求。从表面上看，失业只是一个一般性的社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特别是 2001 年以来，欧美经济下滑，各大公司裁员的浪潮可谓一浪高过一浪。但就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言，这个问题颇具严重性。因为，常规性的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无能为力，而现在似乎又未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孙立平教授分析说，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应将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的问题加以考虑。目前，中国耕地总面积已不到 20 亿亩，人均耕地约为 1.4 亩。现在，农村就业人数增加到 5.5 亿人左右，如果再加上所谓半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大约可达 6~7 亿人。按照 90 年代初的技术标准，目前农业平均每亩投工 14.67 个标准劳动日，就是说，每个农业劳动力，足可以耕种 20 亩耕地。这意味着，要耕种目前中国的 20 亿亩耕地，大约只需要 1 亿个劳动力。换言之，农村大约有 5~6 亿个剩余劳动力。如果去掉乡镇企业可以吸纳的部分劳动力，还有 4~5 亿个剩余劳动力。在这 4~5 亿个剩余劳动力当中，已经有 1 亿人开始进入城市，成为所谓农民工。但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大不如前。实际上，过去两年中乡镇企业减少了 2200 万人。据估计，在未来若干年内，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将以 1300 万人的速度以各种形式流入城市。城市中有几千万失业和下岗职工，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 4~5 亿人，去掉 1 亿个农民工，大约有将近 4 亿人处于待业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将这 4 亿个劳动力安排在什么地方。有人说，经济会持续增长，就业机会就会增加，而且新技术的采用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现在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新的技术革命来推动。高新技术，不但很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甚至会出现排挤劳动力的现象。网络革命的作用人们已经看到，将来影响更大的

是生物技术的革命。农产品的工业化生产即将成为现实，到那时，大部分的农民将无地可种，变成真正的失业者。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4 亿人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由于他们所受教育有限，不能从事经济增长所创造的高新技术工作，只有创造大量的技术含量低的传统性工作岗位，才能解决这一致命问题。毫无疑问，制造新城市是一种最佳的解决办法。因为一座新城市的传统产业、服务行业和其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产生几十万个就业岗位，全国若建设几百个新城市，就会制造几亿个就业机会，偌大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章 城市的诞生

第一节 城市的诞生

城市的根在于“市”：没有市场就没有城市。因此，市场机制、利益机制、效益机制是城市发展的驱动力。

什么是城市？

在中国古代中，城和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城是指御敌围墙，即四周筑有高墙，环绕壕沟的防卫设施。市是指交易市场，即聚集货物，进行买卖，为贸易处所。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里人不断增多，商业兴旺发达，使城和市逐渐融成一体，这便是城市的由来。

中国传统城市发展有两大模式：一是帝都型城市，如长安、洛阳、南京、北京等地，它们是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文化统治相适应的。二是市场型城市，如扬州、上海、广州、泉州等地。它们由于地处口岸要道，易于交通贸易，因市兴旺而为城市。

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细化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是生产力水平和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具有如下属性：

中心性：城市作为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交汇处，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它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决定了它在区域内处于中心地位，起支配和主导作用。

聚集性：城市作为机器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人阶级的发

源地，是人口、人才、科技、经济、知识、财富、问题、矛盾的集中地，可产生地域上的集聚效应和拉动效果。

系统性：城市是以人为主，以空间、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综合利用为前提，以聚集生产要素为目的的繁杂的大系统。它包括城市经济系统、城市社会系统、城市政治行政系统、城市文化系统、城市基础设施支撑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等等，各个系统之间的矛盾纵横交错，各系统又相互循环，就如同一个自然循环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大系统。

城市的中心性、聚集性和系统性以及城市的其他功能，决定了它的高度集约化，可实现低投入而高产出，投资效益大大优于农村。

城市的根在于“市”，没有市场就没有城市。因此，市场机制、利益机制、效益机制是城市发展的驱动力。

第二节 城市的规划设计

城市的制造首先要有正确的理念，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明确的城市发展策略和总体规划。

只有把某产业中的世界性优势都聚拢过来的城市才可能脱颖而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迅速向城市集中，大量的财富将在城市中创造。城市已日益成为新经济和先进生产力的中心，成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众社会文化创造和传播的中心，成为人民群众居住生活、学习现代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场所。城市建设做得好，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居住生活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城市环境和优质的服务保障。

新城市的制造首先要有正确的理念，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明确

的城市发展策略和总体规划。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城市规划是根据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资源优势、人文环境、文化背景和经济实力等诸多因素，所作出的关于该城市在空间（全省、全国、全世界）或时间（历史、现实、未来）上的地位与作用的判析。在制造新城市过程中，战略高于战术，没有理性的战略定位，就没有适合的战术发展，而科学地为城市定位、定性、定量、定向，就是确立城市的发展战略目标。清华大学经济合作研究所所长于永达认为，一个城市在规划未来发展和角色定位时，首先要明确自身特点，再根据自身特点积聚优势，提出城市未来规划。现在，众多城市都把目光聚焦在芯片、纳米、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使得城市设计千篇一律，造成重复建设，这是令人忧虑的。一个城市发展为专业城市的过程是优势集中的过程，也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只有把某产业中的世界性优势都聚拢过来的城市才可能脱颖而出。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点，只能是落于传统城建模式而劳民伤财。以山东威海市为例，其最先的城市产业规划是电子科学、生命科学和新材料。但考察后发现威海最大的优势是海洋和沧桑的历史。从秦始皇东巡威海感叹人生，到甲午海战的悲壮凝重，人们来到威海总会感慨历史的沧海桑田。后来，威海确定“世界海滨博览城”的城市规划，充分发挥海洋优势，体验历史凝重，营造海洋文化。这其实就是一个因地、因史制宜的优势积聚和优势再创造的过程。在规划城市未来时，着眼点应是世界范围，聚集世界优势，制造世界影响。

规划是一只有形的手，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只有让“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和谐运作，方能一步到位地完成现代城市的发展。

案例：

“沙盘”效应引来八方客

据新华网报道，江西省新余市在对其高新技术开发区实行概

念性规划国际招标时，花 500 万元购买了一堆图纸和一个“沙盘模型”。这一破天荒的举动引起了轰动和争议。然而，规划出台后，共有 1000 多名海内外投资者前来参观考察和洽谈项目，引进各类企业 93 家，签订合同资金 16 亿元，“沙盘”所产生的效应，让许多新余人始料未及。

新余市副市长何萍高说：“在中国已经加入 WTO 的大背景下，开发区靠优惠政策，让地让税吸引外资的做法已经过时，投资环境的优化，尤其是以科学规范的管理、先进的规划理念吸引外商，才是问题的关键。”事实证明，一张蕴含着先进设计理念的规划图纸，不但反映了政府规范、科学、认真的管理态度，而且让客商明显感受到新余市强烈跳动的经济脉搏，感受到干部观念的巨大变化。

第三节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式的社会，一个城市对外交通能力的强与弱，将决定着该城市的未来。

新城市在加强网络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赶上发达城市的水平，就可以和发达城市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了。

一个没有良好的基础教育的城市，是不具备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城市。因此，教育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源泉。

制造的新城市要吸引企业投资者和居住者，第一步就是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能源、通讯、网络、教育。在现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优良而完备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城市必须具备的，这是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和生产能力的保证。

一、交通

交通是一个城市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不搞好交通设施的建设，对发展经济就会形成很大的阻碍。这个问题若解决不好，不仅影响人流、物流的顺畅通行，而且直接关乎城市的生死存亡。

交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是城市的生命所系。城市的交通是一张“经济网”，织多大的交通网，事实上就给一个承上启下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多大的腹地。例如上海，水路方面有长江这条黄金通道，公路、铁路四通八达，航空、港口通往国内外各大城市。多元化、立体化的交通网，给上海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绵延上千公里的腹地。大连，有沈大铁路、沈大公路与东三省相通，有港口、航空与国内外众多城市相连，便捷的交通结构，使得整个东三省成了大连的腹地。广州，占有珠江这条黄金水道，同时，又是华南的铁路、公路枢纽，铁路、公路直达珠江三角洲和全国各地，机场通往国内外各大城市，庞大的对外交通网络织就了一张庞大的经济网。

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式的社会，尤其是入世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新城市对外交通能力的强与弱，将决定着该城市的未来。

二、能源

能源已经成为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城市里，电力、石油、天然气是生活和生产必不可缺的。1999年7月29日，台湾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停电。这次停电不仅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使台湾的工业受到沉重打击。仅新竹科技园就损失了50亿元。这次大停电，不仅影响了航空、交通运输、工厂生产、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甚至引发了犯罪活动，使当地居民产生恐慌，不知道在这种环境下，还会发生什么不可预知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能源不但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还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